

# 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提出

赵利栋

---

**【提要】**“半殖民地半封建”是解释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基本概念。对这一概念的既有研究，囿于固定的思维模式，基本是从中共方面的资料进行梳理与解释。实际上，这一概念的形成史十分丰富，通过对国民党左派文献的梳理，可知国民党左派在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前也提出了“半殖民半封建”的概念，并进行相应的理论阐发。

**【关键词】** 半殖民地半封建 国民党左派 施存统

---

“半殖民地半封建”作为阐释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概念，无疑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广为传播与影响深远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在中国的提出与接受，研究者进行过仔细的梳理和研究。<sup>①</sup>这些研究者大多先行设定“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是由早期共产党人提出来的，因而这些研究集中于爬梳早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播方面的史料，集中于对早期共产党人理论文章的讨论，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基本上是中国人的理论探索与努力。诚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及传播，中国共产党方面起了最大的作用。但揆之历史，通过对资料更为细致的梳理，至少可以知道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形成的过程中，实际上并非一曲独唱，而是当时各种政治势力、不同立场学者组成的多声部合唱。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参与国民革命的各方力量对国民革命进行了理论反思，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左派反思国民革命并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进行探讨，分析了中国国民革命的历史任务和国内国际的政治环境，逐步形成了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观点，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形成也起了一定作用。本文希望通过对当时国民党左派发表的一些理论文章的梳理，丰富已有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史的研究。

研究者已经指出，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实源于中国国民革命，即国共合作政策与实践。随着列宁和孙中山的相继去世，国共合作出现危机，同时苏联内部也出现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性质的激烈争论。其争论的理论架构均来自列宁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

---

<sup>①</sup> 较具代表性的成果有：陈金龙《“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陶季邑《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与陈金龙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张庆海《论对“半封建”“半殖民地”两个概念的理论界定》，《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李红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李红岩《中国近代史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方小年《“半封建”“半殖民地”概念考析》，《文史哲》2002年第4期；周兴樑《关于近代中国“两半”社会性质总理论的由来》，《历史教学》2005年第2期；曹仲彬《对中共中央文件最早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考析》，《北京党史》2008年第5期；张海鹏《“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提出及重大意义》，《北京日报》2021年4月12日。

论述。<sup>①</sup>这一争论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和国民党内均引起反响,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也由此引发。

关于中共文献方面最早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蔡和森于1925年底至1926年4月在莫斯科中共旅俄支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已经使用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这两个概念。<sup>②</sup>也有学者认为“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连用最早出现在1926年9月23日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社编译出版的《国际评论》创刊号上,其发刊词写道“我们长久困居在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受尽帝国主义与其走狗——军阀的双重压迫。”<sup>③</sup>还有学者在梳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史时认为,这一概念首次完整提出是1929年中共中央在《中央通知第二十八号——农民运动的策略》中。这份文件指出“六次大会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关系和数年来农民宝贵经验,指出农民运动的路线,其主要精神是争取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农村中反地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巩固无产阶级在农民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保障土地革命的胜利转变到社会主义的前途。”<sup>④</sup>如果稍稍放宽视野,走出事先的理论设定,或许可以发现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理论探索,更加丰富与多线。

## 二

当国民革命出现危机之时,除了共产国际在探讨中国社会的性质以确定中国革命的策略外,在中国国内,不仅中国共产党在做同样的探索,国民党内对中国社会性质也做了相应的理论探索。正如早期中共党员施存统所说,“全国反动的势力与革命的势力都在动摇不安的状态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革命的同志,一切被压迫的民众,都要求一条解放的出路,然而在事实上,多半在徬徨歧路之中。于此我们必须从理论上重新来探索中国革命的问题,重新确立中国革命底科学理论。”<sup>⑤</sup>1927年,米夫以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身份率代表团来中国考察革命,在其著作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在讨论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明纳兹的报告时,表示“国民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谁也不敢骂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底利益”,但汪随后提出一个疑问,“怎样观察中国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否赞成非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当时陈独秀不能从理论上解释这一问题,“只重复了关于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盟之必要等空泛的话”。<sup>⑥</sup>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左派人士的理论探索。他们创办了《革命评论》《前进》等刊物,对中国国民党代表什么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大量的封建残余,是否存在阶级斗争等进行了深入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也开始逐

① 李红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李红岩《中国近代史学史论》,第60—69页。

② 陶季邑《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首次使用——与陈金龙先生商榷》,《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③ 李红岩《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的来龙去脉》,李红岩《中国近代史学史论》,第71页。

④ 陈金龙《“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形成过程考析》,《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⑤ 施存统《中国革命底理论问题》,现代中国出版社1928年版,第2页。

⑥ 米夫《中国革命》,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1933年版,第152页。国民党内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的讨论,参见观复的《国民党与小资产阶级》,汪精卫的《所谓小资产阶级》等文,这些文章均载于中国国民党天津特别市党部指导委员会宣传部编的《中国国民党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北京书局1928年版)。

步深入。

早期国民革命的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而“处于半殖民地之下,各阶级自有力求解放中国,要求独立,脱离帝国主义压迫之共同倾向,中国国民党即为代表此等阶级之共同倾向,从事于国民革命运动”。<sup>①</sup> 国民革命分裂后,国民党左派分别以顾孟余和陈公博为代表,各自以《前进》和《革命评论》杂志为阵地展开论战,“确实为中断了的国民革命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领导着成千成万的革命青年坚决果毅地为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而奋斗”。<sup>②</sup> 顾孟余在比较中国与欧洲的封建制度后,认为中国秦汉以后的封建,“只有上层建筑,没有下层基础的封建”,即政治上的封建割据而非经济制度的封建,因此,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为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sup>③</sup> 陈公博则认为中国社会自周秦以来封建制度“虽早已打破”,但为封建制度提供土壤的土地制度和家庭制度仍然存在,从表面上看,“今日的中国虽已脱离了分封的形式,而实质上终脱离不了分据的实质”,清末的督抚、民国的督军和北伐后的军事集团等都是“历史传统来的封建势力”。陈公博认为“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者是农工阶级”,因此,中国革命的走向不可能是走向资本主义,而是“走向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sup>④</sup> 这一当时的国民党左派内部的理论争论需要进一步厘清中国社会的性质。

中国到底处于什么社会?是殖民地社会还是半殖民地社会?是封建社会还是半封建社会?在这些讨论中,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或者是有大量封建残留的社会,基本上是当时国民党左派理论家的共识。随着讨论的深入,他们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呼之欲出。

在国民党左派创办的刊物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及相关革命策略的讨论中,慢慢地由“次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势力”“封建残余”“半封建”“半封建式”“宗法封建”“封建制度”等概念,过渡到“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孙中山的著作中就出现过中国是“次殖民地”社会的一词。<sup>⑤</sup> 1925年,《中国军人》杂志刊文从政治、经济、文化和主权四个方面论述国民革命的必要,认为清末的中国“文化方面,受宗法社会,封建制度及洋奴化的教育所束缚所摧残,主权方面,因国际资本主义之扩张威权,提倡共管,将中国成了半殖民地”,因此,此时的中国社会是“次殖民地及封建残局的中国”。<sup>⑥</sup> 1928年,《现代中国》杂志刊文指出中国“现在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半封建式的社会”,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但处在半殖民地的特殊状况”。<sup>⑦</sup>

国民党左派较为完整地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来界定中国社会性质,是1928年10月何民魂发表在《革命导报》上的《现阶段的几个根本工作》一文。《革命导报》是继《革命评论》而起的国民党左派的重要刊物。何民魂在文章中有感于过去的国民革命运动中“领导革命的领袖和参加革命的同志们对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中心理论的建设工作,的确是太忽视太不努力了”,“三民主义”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② 《编者说明》,公孙愈之《革命的真理》,上海复旦书店1930年版,第1页。公孙愈之,即顾孟余。

③ 公孙愈之(顾孟余):《中国农民问题》,《前进》第1卷第4期,1928年7月。

④ 陈公博《中国国民革命的前路》,待旦书局1929年版,第17—19页;陈公博《国民党所代表的阶级》,中国国民党天津特别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编《中国国民党到底代表的是什么?》,第2页。

⑤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1页。

⑥ 毓涛《建设民国只有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中国军人》第4号,1925年4月;湘耘《怎样去做革命派》,《中国军人》第8号,1925年8月。

⑦ 希真《目前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现代中国》第1卷第2期,1928年5月;李平凡《民生史观和唯物史观》,《现代中国》第1卷第4期,1928年6月;马澹《中国革命的阶级问题》,《现代中国》第2卷第2期,1928年8月。

一词随着国民革命的展开影响到全国,但“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实际却各有各的解释,纷歧错乱”。何氏指出,一方面“共产派”和自称“历史唯物史观”的次共产派把三民主义的解释纳入马克思的社会革命理论之下,“硬硬地把三民主义拖入马克思的古庙里去”“仿佛三民主义只是马克思社会革命系统下的一支派”;另一方面“暮暮朝朝濡染于欧美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憧憬资本主义统治下物质文明的人们”用“不澈底的欧美各国修正资本主义或社会政策的理论”来解释三民主义。在何民魂看来,后一派的人“忘记了中国社会是一个被帝国主义铁蹄践踏蹂躏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内没有实行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正因为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清,所以,“国民革命四个大字虽然很明显地摆在我们面前和脑海中,而且谁都相信国民革命是目前中国社会的普遍要求和必然出路。”但是,过去支配国民革命的理论“一部分是纯外国的无产阶级的理论,一部分是老牌国货带着浓厚封建色彩的理论,还有一部分是变相的资产阶级理论”,因此,过去的国民革命“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科学的实际的三民主义的核心理论”。

何民魂指出,现在应该研究国民革命的出发点、方法和目的,以及其与欧美的民主革命与苏俄的社会革命之异同,这是因为许多从事革命运动的同志对这些问题多含糊误会,缺少彻底的认识,“有些人以为国民革命仅仅是独立自强的民族运动,有些人以为国民革命是半殖民地及半封建社会的一种变态的革命,还有些人以为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或无产阶级以前的一种革命”,对于国民革命的涵义及发展阶段等缺少彻底的认识。在介绍当时关于国民革命的几种理解时,何民魂使用了“半殖民地及半封建社会”这一概念。他认为,革命的三民主义出发点是“唤醒大多数被压迫民众,建立三民主义的民主势力,以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以和平的方法改造经济”,基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的现状,主张国民革命是“反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运动”。<sup>①</sup>

### 三

何民魂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的概念,是否受到中国共产党或共产国际的影响?这当然是有可能的,因为国民党左派对共产国际的一些理论也是相当熟悉的,比如前面提到的顾孟余曾在文章中频频引用共产国际的文件。就国民党左派一系的理论来看,1925年在解释国民革命时已有过类似的表述,只不过使用的是“次殖民地”和“封建残局”,如湘耘的《怎样去做革命派》中写道“在次殖民地及封建残局的中国国民,要想解除国际资本主义及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必须国民革命。”<sup>②</sup>

就文本来看,何民魂可能受到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施存统的影响。如果把何民魂这篇发表于1928年10月的文章和施存统1928年5月在《革命评论》上发表《对于今后革命的意见》一文的文章进行比较,就可以发现好几个段落几乎完全一致。比如,施文论述国民革命时期对中国社会性质认识的一个段落:

我们过去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对于社会经济和社会阶级的分析太不充分甚至于错误。科学上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名词,到处被人误用或乱用。在没有资产阶级的地

① 何民魂《现阶段的几个根本工作》,《革命导报》第1卷第1期,1928年10月。

② 湘耘《怎样去做革命派》,《中国军人》第8号,1925年8月。

方,大叫打倒资产阶级。在没有无产阶级的地方,狂呼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不知不觉地仿佛把中国社会看做资本主义的社会,而忘记它实在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许多错误的政策和行动,都由这一点发生出来。<sup>①</sup>

这一段落,何民魂在《现阶段的几个根本工作》中完全照抄,因此,他很可能读过施存统的文章。

更有意思的是,施存统在稍后发表的文章中,也直接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来界定中国社会的性质,完整地使用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一词。他在1929年2月发表的《如何统一革命理论》一文中,一开始就指出革命理论的重要性,“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中国革命要成功,“必须有正确的革命理论来指导我们底革命行动”进而认为,要真正懂得革命理论,“必须对整个社会底构造与变革有正确的认识”。他写道“我们生活着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我们便应当研究关于资本主义世界变革的理论。我们现在生活着的国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我们便应当研究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制的中国社会变革的理论。”随后,施存统分析道:中国革命的性质决不那么简单,“它是更复杂的现象”,从内部关系来说,中国社会“还充满着封建遗制与封建势力,封建阶级(官僚、军阀、豪绅、地主等)还处于统治的地位,显然需要推翻封建阶级的民权革命”;就对外关系来说,中国社会“乃是帝国主义支配下的殖民地,全国人民都做了帝国主义底奴隶,显然需要打倒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sup>②</sup>

在《复兴中国革命》一书中,施存统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中国社会的性质及革命的力量,社会各阶级的状况也作了深入阐述与分析。施存统首先指出当时中国革命既不可能是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一切革命的同志,我们大家试凝神想一想:中国的革命是什么性质?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吗?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吗?都不是的吧。这两者在目前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社会基础都不充分”。在施存统看来,当时中国的革命分子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小商人、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等),“任何一个阶级都没有单独成就中国革命的社会力量”,只有这三种力量结合起来,才能完成中国革命。<sup>③</sup>同时,施存统强调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中国革命固然有他的世界性,同时却有其历史性”,因此,中国革命不可能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也不可能是土耳其革命,“乃是另一种历史的形式”。在施存统看来,各国革命的历史给中国革命许多教益,值得中国革命者参考,但“不能刻板地移植过来”,而“应该懂得中国的‘此时此地’”。<sup>④</sup>对这一层意思,施存统多次强调“我们是在中国革命,不是在外国革命;我们是在现在革命,不是在将来革命。”“中国革命者最应当注意叫应当努力的,还是这个现在。中国革命者最应当注意的是现在的中国。”<sup>⑤</sup>

① 施存统《对于今后革命的意见》,《革命评论》第1期,1928年5月。

② 施存统《如何统一革命理论》,《民众先锋》第5期,1929年2月。当年中共对于施存统国民革命理论的批判,参见恽代英《施存统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布尔什维克》第2卷第4、5期,1929年2月、3月。瞿秋白则直呼施存统为“有理论的叛贼”,参见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的报告》(1928年4月),《瞿秋白集·政治理论编》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5页。恽代英认为,施存统批评那些先行国民革命再行共产革命的说法是“抄袭外国革命的理论”,但无论“抄袭法国革命,或是抄袭俄国革命,都是一样的错误”,“施存统这些话可以说是对的”。恽代英认为施存统对于革命对象和中国社会各阶级对革命态度的分析,“大体亦是对的”。但是,恽代英指出,施存统理论的问题是,他忘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实际上把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拱手让于资产阶级,因此,施存统的理论成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圈套”。

③ 施存统《复兴中国革命》,上海复旦书店1929年版,第11—12页。

④ 施存统《复兴中国革命》,第13—14页。

⑤ 施存统《复兴中国革命》,第39—40页。

由此,施存统分析了当时的几种革命学说,认为国家主义派的全民革命说和单纯的民族革命说都没有详细“观察中国内部社会情形”,指出“他们只知道中国是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而忘记了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的社会。只知道打倒资本主义的紧要,而不知反封建势力尤要;只知道资本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最大敌人,而忘记了封建势力是中国革命最凶的敌人。”<sup>①</sup>为什么如此说?施存统认为,从国际上来看,中国是资本主义的一部分,然从中国国内的关系说,“直接统治中国的还是封建阶级,中国封建阶级,现在确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受资本主义支配,但是封建势力,不仅仅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他自己还有特殊的支配意义,他自己也还有相当的特殊势力。”因而中国革命,“从历史上说,现阶段的确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其主要的任务在于推翻封建阶级和扫荡封建遗制。然在世界大势力潮流上,是应当无产阶级革命起来打倒资本主义。中国是个特殊的社会。也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个半封建的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同时又是个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国家”。因此,施存统总结说“我们过去只知道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而忘记了中国还是一个半封建的社会,因之,我们过去的革命工作,多偏重于反帝国主义,而忽略了(或轻视了)反封建的势力。我们不知道中国民众要获得解放,必须推翻整个旧的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在施存统看来,“中国民主革命,与反帝国主义有密切关系。我们要完成民主革命,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也必须进行民主革命。这种对内对外的相互关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无可避免的。四十年来的中国革命史充分地说明了这种事实。”<sup>②</sup>

以上只是粗浅地梳理了国民党左派刊物中较早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情况。这一方面说明,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理论史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地清理史料,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概念最后在理论界的流行实际上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当然,真正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说作出深刻阐释并将之作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主干的,当推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作者赵利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邮编:100101)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张舰戈)

① 施存统《复兴中国革命》,第116页。根据《复兴中国革命》一书的序言和《中国革命问题》的前言,可知这是施存统1928年11月在国民党左派所办上海大陆大学作的演讲。大陆大学是国民党左派1928年在上海设立的一所学校,主要培训改组派干部,施存统任该校训育委员会委员。参见查建渝编《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122页。

② 施存统《复兴中国革命》,第133页。

depth research. Two important issues that need to be further addressed are how to write global history by scholars who embrace national identity and how to construct a global hist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 **The Spatial Turn in American Urban History Research // Li Wenshuo**

American urban history research originated in the 1940s and developed rapidly in the 1960s and 1970s. Since then, few historians have identified themselves as urban historians, while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them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cities. Spa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in numerous studies.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spatial turn” in Western studies of social sciences, especially neo-Marxism, but also a reflection of urban spatial changes in the academia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urban history research has turned to space in the following two aspects: on the subject of research, space is no longer the site where research objects are located, but space itself also becomes the object of the research; on the scale of research, historians are adopting a transnation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urban history through the flowing of personnel, materials, capital, and information. The spatial turn has not only deep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urban issues, but also broadened the scope of urban history. It is a good source of reference for studies of American urban history in China.

### **Exploring Long-term Growth and Inequality: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English-Language Academia // Xu Yi, He Fenglun**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global economic divergence” about the long-term growth and inequality of countries from the fiftee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English-language academia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fter 2000. Western scholars have been constructing various th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databases to quantify the long-term growth and inequality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global economy. Based on these databases, they have also established a complete theoretical model to account for the origin,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and cause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se new databases and theoretical models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oday’s global unequal economic system. A reassessment of studies of the great divergence of global economy in English-language academia of the past twenty years is of great reference value for widening Chinese perspectives on studies of global economic history.

### **Philip Curtin’s World History Study and His Comparative Approach // Wei Xiaoji**

Philip Curtin is a pioneer in the study of new world history. Since the 1960s and 1970s, he has proposed a comparative approach on world history against the fragmentation of regional histories and the superficiality of the compil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world history. He has made prominent achievements in studies of issues such as cross-cultural trade, plantation, expansion of the west, Atlantic history, global migration history, and global medical history, and provided an evidence-based approach to studying world history using case studies as method of analysis. Moreover, Curtin cultivated a large number of outstanding world history scholars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World History” program, and many of them have formed today’s leading force of world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valuate Philip Curtin’s comparative approach on world history in China today.

### **The Kuomintang Leftist and the Conception of a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China // Zhao Lidong**

To interpret the nature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is a basic concept. The existing studies on this concept are constrained by certain stereotypes, and they have been predominantly based on sources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conception of this idea seems more complicated than previous views. With a scrutiny of documents from the Kuomintang lefti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it was this leftist faction that had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semi-colonial and semi-feudal” before the great debate on Chinese social history, and carried out corresponding theoretical elucidation.